

外 国 学 者 评 毛 泽 东

点 评

毛泽东

顾问：廖盖隆 林茂生 李君如
主编：萧延中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



点评毛泽东

DIAN PING MAO ZE DONG

目 录

第二卷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第三章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宏观透视



- 导言 219
- 简评毛泽东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220
- 40年代，许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宫）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人们（特别是西方的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富有灵感的圣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另一看法开始占上风：恰恰相反，他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模型铸造的一个严厉、专断的暴君。
- 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 [日] 竹内实 229
- 如果让我从中只挑选一个人的话，那么，我选秦始皇。中国历史第二人要算孔子。作为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我认为，中国历史第四人是邓小平。
- 毛泽东：一位需要公正评价的历史巨人 [美] 迪克·威尔逊 231
- 尽管有五卷选集和学者的外貌，然而从本质上讲，毛是一个重于行动的人。用明智的话说，毛是个粗莽的哲学家。他醉心于理性建树。但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伟大的思想家。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状况看，毛是位引人发笑且是轻重的人物。他唯一的渴求是你接受教育不足。毛大概富于报复性。但对待反对者并不残忍。至少以其他中国统治者和共产党统治者的所为作尺度来衡量的话是这样。毛的缺点是无法和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且不因毛曰如何而改变观点的人共事。毛天生就是一位导师。
- 毛泽东的肖像 [美] R. 特里尔 236
- “一位典型的中国大人物”。“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是显得慈祥宽厚。”“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怎样说才贴合毛泽东的形象？农民造反者？军事统帅家？诗人？帝王？”
-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 [美] 弗朗西斯·苏 246
- 毛的中国社会观的真正目标只在于对一完美的社会模式作出描绘，并指出他希望中国前进的方向。要使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符合他的设想。这样的任务对任何人包括毛在内都是太过分了。毛的中国社会观在60—70年代受到了特别严峻的考验。
- 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 [日] 井上清 251
- 似乎今天中国共产党一说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指“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还有一个群众



目 录

路线。然而，对这种群众路线今天已经无人问津了。另外，毛泽东的其他一些提法，尤其是晚年的一些提法，都认为从根本上错了而加以否定。因而，即使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也不大吃香了。

毛泽东的成就与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

- 毛泽东的激进改革 [美] 墨子刻 253

毛泽东的激进改革不仅让人们表达了愤怒，而且还满足了人们要求建立某种道德上一致的社会的强烈愿望。因此，他赢得了如此狂热的支持。正是这种长期受挫的愿望与来自西方思想和行为的爆炸性结合，加速了中国的变革。

- 简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加] 陈志让 256

毛是新一代的造反农民的领袖。

由于他依靠的是政治上落后的农民。他一定要找到唤起他们的方法。诸如减租减息以及重新分配土地。因而，他攻击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且他事实上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 我看毛泽东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260

无休止的斗争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东西，而且实际上也是他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度化的东西。

中国的正式评价是：1949年以前，大部分是正确的，1949年以后正确方面不到一半。由此出现“三七开”（即七分正确，三分错误）。这近似于毛泽东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还出现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以及“六四开”的评价。然而这毕竟不能算作科学的评价。不能算作有意义的评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出色的成功的一年或毁灭性的失败的一年与好坏难分的几年比较，也许比重更大。

美日学者对谈录——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

- [美] 本杰明·史华兹 [日] 中嶋岭雄 265

从马克思主义到今天的毛泽东思想。与其说他学到了极端的“斗争”原理，莫如说正因为已经认识到“斗争”有积极的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吸引着他。

-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日] 野村浩一 271

造反有理的“道理”

超过马克思主义

实现人的转化

- 关于毛泽东思想性质与分期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279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影响力，在晚年，随着这种趋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一直到死，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 注解 288



占
评
毛
泽
东



点评毛泽东

DIAN PING MAO ZE DONG

目 录

第四章 毛泽东政治权威的起源、依据和功能

导言 293

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 [美] 弗里德里克·泰韦斯 294

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层人物由于毛泽东早年的成功，长时期地向毛泽东的权威让步。甚至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10年中，虽然高层领导人中的多数并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1949年的胜利给毛带来的超凡魅力使得这些人不能采取行动来反对毛。

(1) 1949—1958年，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得到完全巩固的时期；(2) 1959—1965年，毛泽东的行为在高级官员中引起一些保留意见，但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3) 1966—1971年，毛泽东运用他的超凡魅力演化法制的作用，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4) 1972—1976年，出现了对毛泽东权威的有限挑战。

是党的领袖还是“天子”——论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意义

.....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316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大量表现出对毛泽东的过分称颂，没有把他看作仅仅是集体领导之一员，但是他个人的地位并未像后来以及延安时代那样突出。

谁批评毛泽东的政策，毛就自觉不自觉地视之为叛逆。对胆敢如此批评的人一定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他也许正因为晚年陷入传统主义而不能自拔，才成为一个以实际行动打破传统观念的人，以彻底暴露其荒谬性的实践被除了人们头脑中的“天子”观念。

论毛泽东的权力、权威及合法性概念 [印度] 莱恩·N·夏梅 324

韦伯主义的领袖魅力权威是基于领袖的超凡魅力，而毛的权威则是通过不断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人民群众保持经常联系，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能量。

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 [美] 雷蒙德·怀利 328

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中共的官方理论，犹如通常分析其他历史现象一样，谁都难以避免作出这样的结论：成则为主

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 [美] 本杰明·杨 341

如果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能够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那么他们会走出窘境；如果不能，那么毛泽东就作好准备重新起而掌权。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此时对我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

从革命奠基者到“红太阳”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347

直到1942年，在经历了七年思想妥协和政治变动之后，他和他的思想才独领风骚，支配了全党。毛的思想被称为“火车头、指南针、灯塔、照亮道路的明灯”，甚至是一种可以被用来创造“世界上各种奇迹”的神秘武器。



目 录

注解 361

第五章 毛泽东个人及社会的心理分析

导言 371

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 [美] 卢西恩·派伊 372

大约八亿中国人是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的。我们时代中还有哪个凡人能够再群众的拥护方面和他一比高低?追随者们能够看見其领袖人物精神上的弱点,但是他们不願意看破他们的领袖,因为害怕这会毁灭对曾经在他们生活中起过作用的魅力的回忆。

革命领袖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 [美] 理查德·索罗门 379

“文革”后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关注一种“风貌”,亦即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寻求重建中国政治生活,以便强调大众的参与,从而防止由精英管理阶层统治的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政治动员与传统中国政治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毛泽东努力构建的“对立面的统一”。

[附1] 毛泽东: 其人及其象征 [美] 厄洛尔·迪特默 385

派伊倾向于降低他父亲的作用而把他母亲视为他革命生涯的主导精神,他不再专注于她那宝贝的长子,而是把关怀投入到他年幼的弟兄们身上,这引起了毛的愤怒。他通过把母亲理想化而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也通过一样他从未在他兄弟之间实行过的非个人的观念形态的理想化兄弟关系来掩饰他对兄弟的怨恨。这种伴随失宠而来的早期的任性,使得他总是受到对亲密关系和别人利用其感情的可能性的持久恐惧的困扰,这种恐惧贯穿于毛的一生之中,使得毛必然在别人尚未抛弃他之前先抛弃别人。

[附2] 美国汉学界中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 [苏] Y. 耶基莫娃 390

除了诸如当年毛泽东的心理状况等主观原因外,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状况忧虑的客观原因是担心中国将“改变颜色”。这种原因就是正统毛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以及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地位的削弱。

注解 401

第六章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导言 405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的地位

.....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406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旨在改变中国人思想和行为规范的革命呢,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是某个人一手造成的,还是它反映了





点评毛泽东

DIAN PING MAO ZE DONG

目 录

中国社会内部某种根深蒂固的倾向。

- 简论文化大革命 [英]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411

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除了他的许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实践。

- 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 [美] 本杰明·史华兹 41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苏联人在其辩论中直接了当地断言“毛泽东主义集团”就是存心要毁灭中国共产党。

- 历史与意志 [美]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 429

他的思想越受到崇拜，他所扮演的领袖角色就越不起眼。因此就像退位的皇帝一样，他逐渐地被剥夺了重大的决策权。他后来声称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但是他的语气却是伤感的和尖刻的：他失去得太多了。

- 文化革命的概念 [美] 莫里斯·迈斯纳 442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对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蜕变为大混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也使人们能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和政治理由轻易地给某些团体和个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而横加迫害。

- 文化大革命的再评价 [美] 卢西恩·派伊 454

毛泽东之所以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容易只在嘴上说相信“毛泽东思想”，而难于了解他们实际上是怎样想的。

- 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实行革命性变革的谋略

..... [美] 李鸿运 463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他认识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存在哪些缺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目的是哪些？实际上他是如何领导运动的？他的领导是否存在某种明显的模式？

- [附]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徐友渔 489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问题基本上集中于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的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注解 477





导 言

本章各文的作者均为著名学者和研究专家。他们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同时都发表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著作。施拉姆是中国学术界最为熟悉的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著名专家。他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早有中译本在中国流传。其重要论文绝大部分也被收录到中文版《施拉姆集》之中。竹内实则以编撰《毛泽东集》（十卷本）和《毛泽东补集》（十卷本）而闻名于国际毛泽东思想研究界。该书所收毛泽东文稿均以最初版为蓝本，对解放后版本的修改之处——予以对照和注明。这种对照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它不仅为读者节省了不少阅读时间，而且使读者极为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演化轨迹。井上清是当代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两大卷的代表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衰》，是当代世界史和日本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参考书。有意思的是，他是成立于60年代中期的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晚年他仍坚信毛泽东思想具有经久不衰的永恒意义。加拿大籍的华裔著名学者陈志让是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开拓性人物之一。198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以及在翻译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方面的较深造诣，使他对西方毛泽东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还著有《中国与东亚社会史》、《袁世凯》、《军阀政权》等书，以及关于义和团、共产主

义运动和经济史方面的多种论文。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之一，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其一系列专著，如《严复与西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论五四运动》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都已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1952年他与老师费正清等一起最早提出“毛主义”概念，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墨子刻则是美国中国思想史专家，其名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以论证中国思想的连续性而被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引证。本书中，他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固有的“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与思想的重要途径。最后，特里尔和威尔逊是两部著名的《毛泽东传》的作者。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是夹叙夹议的“传记”，但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则迥然有别。其中好、恶、褒、贬均不尽相同。

鉴于上述专家的大部分著作均有中译本，这里或收录其专著的“导言”及“结论”部分，或收入其散论的文章，以为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读者导引线索。提供参考。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简评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40年代，许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宫)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党国家的统治者。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人们(特别是西方的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富有灵性的圣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另一看法开始占上风：恰恰相反，他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模型铸造的一个严厉、专断的暴君。

20世纪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评价。40年代，许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宫)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党国家的统治者。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人们(特别是西方的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富有灵性的圣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另一看法开始占上风：恰恰相反，他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模型铸造的一个严厉、专断的暴君。

毛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还兼有其他。人们常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从俄国经验汲取一些可以类比的词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解释的话，更恰当的应该是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

他本人虽然没有缔造中国共产党，但他为夺取政权最终制定了策略，他领导党走向胜利。从这个意义上，他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列宁。他也完成了斯大林那样模棱两可的作用：斯大林不仅领导了农业合作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通过他摧毁党内竞争者的方式使整个事业濒于

崩溃。此外，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中国的彼得大帝；他是试图吸引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使国家现代化的第一个统治者，而无论是在帝国覆灭之前还是之后，他的历届前任都未像他这样做。

甚至在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之前，彼得的民族复兴目标就吸引了他。因此，我们必须从他生平事业的这方面谈起。用一两段文字是不足以说明19世纪末中国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的。但是不涉及这些问题就不能理解毛本人和他的政治搏斗。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在几十年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看来它不仅威胁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中国的完整，而且也威胁着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与文明本身同样长久的民族遗产的生存。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统治阶层最初的反应是企图只利用西方技术的成果，特别是现代武器抗击外国人并扑灭国内反叛，而在同时保持中国无与伦比的“道”完好无损。一代人之后，189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诞生。当时，对西方的机器和西方的知识，门户敞开得稍大了一些——只要这些新学被牢牢地置于适当的位置。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以后的生平年代里，毛泽东不止



一次地把中国革命的开端定为19世纪末。这既是因为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因为它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出现。

这些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是重要的，但是受西方影响而造成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全部进程是更为广阔、更为意义深远的。其结果是，14岁的少年毛泽东在阅读第一本政治小册子时，帝制及其支柱孔子的思想就已经受到猛烈的动摇和怀疑。希望把它改良得面目全非，成为欧洲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人和希望彻底破除它的革命者正在辩论。四年后，1911年秋，在一致的但比较有节制的数省的起义面前，摇摇欲坠的帝国最终垮台。在这些省份中，毛的故乡湖南是第二个起义的省，毛得以从军保卫新的共和国。

虽然毛这次从军只有半年时间，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不断对武德大为赞美，而从事战争则成了他中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的生活方式。

毛成熟前后的条件是1915年出现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企图摈弃中国传统中一切旧的、过时的和腐朽的东西，而代之以大部分是从西方汲取的新的、新鲜的和有生命力的思想。但是，虽然在“打倒孔家店”这个否定的目标上易于取得一致，但在对未来道路肯定的选择上，这个“新思潮”的党很快就分裂了。当时的条件加剧了这种不和。欧洲列强因为技术先进和军事强大而受到尊敬，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肆意杀戮并没有增加他们在道义上的威信。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很快就作为也许更适合亚洲条件的取代模式而在中国引起注意。巴黎和会决定把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交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也促成了对西方幻想的破灭，并招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学生示威。这个激烈和决定性变革的时期得名于此，现在通常被称为“五四”时代。

两年之后，知识分子和佼佼者两极分化加速发展的进程导致了1921年6月《见草》的解

¹⁾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毛当时已经作为报纸撰稿人和1919年夏天在长沙(湖南省会)的政治组织者而小有名气。在那时之前的五年中，他在长沙一所师范学校受到了中学和西学的良好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两年中，毛泽东对湖南省工会运动负总责。作为对莫斯科命令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议定了一种同盟的形式(包括它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从1923年至1926年，毛在国民党的几个组织中积极工作。从他的未来来看，在这些组织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6年5月到9月，他领导了讲习所。9月，作为讲习所主办的一组文章之一，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国民革命与农民》。以他后来很少能够与之媲美的清晰透彻的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笔调，总结了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看法和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策略的结论。

毛泽东论证说，农村地主阶级的统治构成了现存反动政治秩序的主要基础。因此，对现在秩序的决定性打击只能由农民去进行，农民站在地主的直接对立面并追求明确的政治目标（不像城市工人，只关心他们生活条件的短期改善）。毛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农村的农民革命），没有第二种形式。”

虽然共产党人甚至在1927年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在城市中仍得到一定的支持，但是，以后共产党同国民党十年内战的主要战场是农村地区。在那里，毛于1928年在江西南部^{〔见注解3〕}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根据地。起初，毛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虽然他时常同在上

海的中央委员会发生争执。后来，他逐渐被架空。他的竞争对手放弃了毛泽东和朱德发展起来的“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而去进行更类似正规阵地战的战争，但是他们后来因为在1934年10月败在蒋介石手下而威信扫地。蒋介石迫使他们放弃了现有的根据地。他们开始向西北长征。其结果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再次取得了对军事的实际控制权。此后，他的领导地位稳步加强，直到1943年他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随着日本的全面侵略，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人自1931年以来已经逐步占领了相当一大部分中国领土。在以后的岁月，毛告诉日本的代表团不要过分地为他们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歉意，因为正是由于日本皇军

的介入，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胜利。虽然应当为毛对矛盾和提出反面论题的嗜好打一些折扣，但在这个说法中有很大的真理。共产党人对农民渴求土地的号召力并不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完全没有影响。但是，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在三个重要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和毛本人作为主要的政治领袖上升到全国和国际的显赫地位布置好了舞台。

第一，日本入侵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同他的对手再一次的联盟，并因此使共产党人得到喘息机会。第二，战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日本人只占据了城市和交通线，因而把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和东北，暴露于游击队的渗透之下，使共产党人得以在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中建立了基层的政治和军事控制。第三，这些抗日游击作战的成功，帮助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

了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爱国的政治力量而赢得支持。1937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记述在中外报刊上的出现，使毛得到机会把自己表现为中国民族斗争最顽强的斗士。

1939年至1940年，毛创造出“新民主主义”一词来表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征。这个概念主要是来自列宁关于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权力，而同时不追求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1905年，列宁提到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总结了他在过去十年内外斗争中所精心设计、而在同国民党重新进行内战的三年中达到顶点的概念，他把他将要去建立的政治制度称为“人民民主专政”。

考虑到他所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附属国或半附属国内阶级合作更大的可能性，他在分享政权的阶级中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还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春天，毛还宣布，中国革命在过去走了一条非正统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在将来要走正统的城市领导和指导乡村的道路。

虽然他因而表明了，他得益于列宁的理论和苏联的榜样，但他从来不打算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早在1936年，他就向埃德加·斯诺宣布：“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当然不是要把它交给莫斯科！”^[见注释4]正如后来斯大林本人所承认的，毛和他的同志们事实上只是通过坚持进行内战才赢得了全国胜利，而当时苏联人是在敦促他们妥协以避免冒失败的风险，避免对世界和平造成可能的威胁。

尽管如此，如毛后来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是以“从苏联人那里照搬”为基础的。毛和他的同志们有游击战争、动员农村的农民以及在基层进行行政管理的经验。但他们既无管理一个国家的、又无搞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手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从

苏联，他们又能从哪里得到鼓舞和支持呢？

这样，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制定的。它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包括一些成套的重工业工厂。但是，不出两年时间，毛就采取了一些步骤，它们最终导致与莫斯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盟完全破裂。

作为这种倾向的开始，即急剧加速建立农业合作社，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与苏联模式一点也不矛盾。无论如何，强制的集体化恰恰是苏联的特点。事实上，要害之处与其说是决定本身，倒不如说是毛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他的同志们的方式，和作为其结果的他的个人权威同党的决策机构的作用之间的紧张状态。

1955年7月31日，毛向一次省和地方党的书记的特别会议阐述了关于加速进行合作化的迫切性的思想——会议是专门为这个目的召集的一一而不是首先把这些思想提到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决议，但是因此而产生了对执行毛路线的推动力。以至于当10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在领导层中的同事发现，他们是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置于既成事实之前了。

可以论证说，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毛的信念，即迅速建立合作社的好处(在于组织规模的经济实惠和治水方面，也有助于国家向农民强征剩余产品方面)大于所冒的风险，是正当的。但是，即便他是对的，这个插曲也坚定他已经具有明显表现的信念，即他享有对历史进程独特的洞察力。因而，加速了他从形式上的、如果不是由于与他同等的人民民主推举出来的、列宁主义的党的领袖向更传统的模型铸就的专制君主的转变。

毛思想的其他重要的新倾向也在50年代中期出现了。其中，首先一个倾向包含在他1955年7月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论证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社会改造可以走在技术改造的前面。某些看起来成功地不借助任何外来帮助而根本改善了物质条件的合作社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而愈发相信当为革命的目标而动员起来时，中国人民有随心所欲地既改造自然，又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改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能力。

第二，甚至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前，毛泽东和中国领导就已经讨论了改善从旧社会接受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的措施，以保证他们积极地并高兴地参与建设新中国。随着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在波兰、匈牙利引起的反作用，毛提出了所谓“百花”政策，这有着允许批评者发表意见和同党内的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双重目的。当作为结果的“大鸣大放”失去控制，并使这个政权的基础成为疑问时，毛不是生他自己的气，而是生出卖了他的信任的非党知识分子的气，生领导中他那些反对这个实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同事的气。结果是，他更爱好越过正式的党和国家的机器而直接向群众呼吁。

最后，在1956年4月一篇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来他说这个讲话标志着他精心设计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的努力的开端）中，毛十分强调既在政治方面又在经济方面的非集中化。对毛来说，这种非集中化的最终目标是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贡献。1943年他在延安制定的群众路线和50年代中期之后不断提出的有关论点，从不意味着让群众为所欲为，而是听取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然后在中央进行综合阐述。但是，1956年非集中化的执行方法却导致了一个所谓“双重管辖区”，由在北京的各部和地方的政治当局分享经济决策职责，其结果往往是混乱和低效率。

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这一时期政策的标志是彻底地公开同苏联模式分道扬镳，但这绝不像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毛对道德刺激与物质刺激、红与专、大工业与小工业是同样强调的。成了毛整个经济战略的中心的“两条腿走路”政策是用这两腿尽可能快地走路，而不是用小型的土方法跳跃行进的政策。从任何意义上讲毛都不是（像他在西方的

某些崇拜者那样）主张“稳定状态”和增长率为零的计划经济的人。恰恰相反，在他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全部27年里，毛从未停止过号召经济进步，并且号召用数量单位下了定义的进步：多少吨钢，多少吨粮，等等。

在毛以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同时，他在为取得发展而采取的方法上，又有某些方面反映了对技术进步意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其中之一在于他对现代知识持有者——知识分子的态度。1956年1月，他宣布，为了达到“在几十年内消灭中国经济上、科学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两年以后，他由于“百花”期间知识分子的行为而感到幻想破灭，毛干脆说：“自古以来，建立新思想学派的人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年轻人。他们有能力一眼认出新事物，并掌握这些事物，向老保守开火……当然，在学校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不是提议要关闭一切学校。我说的是，上学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见第12章）1958年下半年，毛赞同并促进了建立人民公社，这本来不包括在最初的“跃进”蓝图之内。到1956年底，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过渡在字面上已经完成，但是在许多地区直至1957年这些合作社才真正开始起作用。结果是，1958年农民突然发现他们的世界被翻转过来了，他们被投入新的巨大的几千户人家的社会组织中。而前一个剧变几乎没有结束。毛承认大跃进的某些方面，如炼钢铁的“后院炉子”，是鲁莽的；但同时他又坚决地为他的政策，特别是为人民公社辩护。

1959年春，他承认有必要作一些调整，这包括将所有制分散到公社的下属单位（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中去，使它们的规模缩小到更人道、更便于管理的程度。但是，他不顾其他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全体一致的意见，坚持认为，人民公社的概念，和对中国虽然“一穷二白”，但能够跃进到其他国家之前的信念，都是基本正确的。在所有的最高领导人中，只有国防部长彭德怀勇敢（或

者说天直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上公开向毛挑战。但是，其他人看到了不祥之兆。因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1960年，毛开始在人民解放军建立一个取代的权力基地，新国防部长林彪已经开始把军队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大约在同时，毛开始察觉到不仅在苏联，而且就在中国本身，在党和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中，在技术和艺术界的特权阶层中，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分子”。他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1962年秋，他发动了一场推动这种阶级斗争的运动，两年之后，在1964年底，当刘少奇主席拒绝接受毛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的“走资派”的号召时，毛决定：刘少奇一定要下台。

与这些内部发展平行出现的是与苏联的公开破裂，毛是这个破裂的首席设计师。中苏分裂的原因可追溯到赫鲁晓夫1956年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毛一方面承认斯大林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反对他认为是对斯大林的片面的和非历史的评价，这一评价没有赞扬斯大林的成就，却把也由于苏联的社会性质而造成的消极现象归罪于斯大林个人。更重要的是，毛反对赫鲁晓夫发起这场运动的方法，他不与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事协商（包括一些像毛这样的人，他们比赫鲁晓夫的资格要老得多），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共产国际时期，可以像一个世界大帝国一样听命于莫斯科。

实际上的分裂来自苏联对大跃进政策的反应，莫斯科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不可靠的，因此可能会浪费苏联纳税者的

钱，它在思想上是自以为是的，是不可接受的。这些看法使毛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1958年坚持认为，前景是中国将在苏联之前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中国人民公社化的要求大肆嘲弄，1960年又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这种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已经受到大跃进政策的恶果影响的中国经济，使许多大工厂未完成就停止建设了。毛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侮辱，也不会忘记经济上的损害。1964年，他说，苏联货无论怎样都是既粗糙又昂贵的，“还不如与法国资产阶级打交道，他们还有一些商业道德概念”。

毛的同事对苏联人都不抱什么同情，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包括刘少奇，看来似乎在1965年争辩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毛此时对苏联人已经像对美国人那样怀疑了。这样，中国领导在国内、国外问题上都分裂了，文化革命的场景已经布置好了。在这场大动乱开始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激进地向党，并在实际上向一切形式的权威提出异议。回顾一下就可以清楚，毛对从上而下的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看来那样彻底。虽然他发动了用“造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离重庆飞返延安。这是在重庆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前排右二为陈诚。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毛泽东和通行的张闻握手。

“反有理”的口号武装的红卫兵去反对党的机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消灭党内那些使他生气的人，而不是因为他已经停止相信对政治进程的集中控制。

1967年2月，当明确地面临在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抉择时，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同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后来他们成为“四人帮”的二分之一）的谈话中，毛谈到上海一些人要求把“长”都取消，并评论说：“这是极端无政府主义，是非常反动的。如果不叫某人什么‘长’，我们称他是‘勤务员’或助理员，这实在将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改变，实际上他们将一直是‘长’。”在讨论如对张、姚刚刚在上海所做

的那样建立作为政府机关的公社的异议时，毛问道：“我们把党放到哪里去？……公社中应当有一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以后九年的历史极为清楚地表明，在毛看来，它是代替不了党的。

在毛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里，他努力把领导的必要性和他一直充满信心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与构成了文化革命的道理和原因的反对特权和鼓励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作为毛一生中最后发表的“指示”之一，而在1976年5月被引用的毛的一段话说，将来还要继续爆发革命，因为“小官、学生、工人、农民、士兵不喜欢大官压迫他们”。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它听起来非常像一个从不会

受压制的毛说的话。尽管他仍然身体力行“长”的必要性，但是他无法抵制反对他们、打击他们的诱惑。

此外，这个事业之上还有一个根本的含混不清之点，因为群众“造反”权利的保障仅仅是一个行使个人权威的人物，而这种权威在官方与公元前二世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是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毛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江青及其同党的看法混为一谈，他们宣扬无休止地反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思想，导致了一个宫廷集团操纵和利用的无政府主义的局势。但是正是毛为这些过火行为打开了大门，并默默地宽恕了他们。

同样，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领域中，1971年至1972年期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妥协，技术的前进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得到重新强调，而这些一贯是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甚至就在这个新道路的设计者周恩来去世之前，妥协就被推翻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要性的一切认识都被疯狂的政治口号淹没了，一切外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反革命的。1972年仍然脆弱的平衡这么快就被打破了，无疑，一些罪责归咎于毛，他年老有病，没有能力控制他的妻子及其同伙的行动。尽管如此，他对道德和技术之间关系的态度与他的整个思想一样直到最后都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些矛盾中，最有特点和矛盾最激烈的是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形成的基本上是源于西方的许多激进思想与他日益传统化的统治风格之间的矛盾。他谈到阶级斗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的思想的主流。尽管毛有时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图把它们运用于中国的实践，然而同时，毛乐于接受文化革命左派把他抬到半神的高度。这与其说是效法列宁甚至是斯大林，还不如说主要是出于中国政治传统。

毛的行为中最黑暗的一面无疑是善于对轻视了他或惹他生气的人加以报复。1958年5月，

毛赞扬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为了表明他的目的是坚定的，同意了这样的建议：借古讽今满门抄斩。见原书注解6文化大革命中，毛自己恰恰使这一公理得到了实行。60年代初，他受到三位作家邓拓、吴晗、廖沫沙含蓄的借古讽今的批评。其中第一个人在1966年5月16日和17日被打死，见原书注解7恰在这时，毛亲自接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第二个人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北京市副市长，他不仅本人被折磨致死，而且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只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只有廖沫沙活下来，参加了1980年12月审判江青的大会。

1966年至1976年期间发生的成千上万人的残酷的死亡，无疑许多必须归罪于江青及其盟友的政治野心和个人怨恨，这些事情只是在毛的消极的默许下发生的，有些事毛甚至都不知道。但是有些死亡，如邓拓、吴晗，或毛过去的接班人刘少奇于1969年12月被迫害致死，毛本人必须负主要责任。从这方面说，毛的确是彼得大帝，如果不说是伊凡雷帝的话。

尽管中国是不愿用这种类比的，但是毛最后十年的统治形式同中国过去的“暴政”形式之间的联系近些年来不断被人想到。1976年以前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大部分罪责当然要归到“四人帮”身上，但是人人都清楚明了的是，毛也持有一个近乎传统的观念：他得到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的权力是历史所赋予的，如果不是上苍所赋予的话。

1949年，毛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消灭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资本主义前的遗留物的意义上讲，这个革命的职能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毛认为，这一进程的一个方面是增进民主的社会道德标准来代替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精神。但是近似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实验于1957年下半年突然结束，从那时以后，虽然也不断谈到民主（毛比任何人谈得都多），但是公民对政治进程的干预与其说是毛自1917年以来不断倡导的进行“自我意识”和“有觉悟的活动”，倒不如说是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个礼仪上的事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本人的看法是，中国人民自己出了差错，在1970年12月同埃德加·斯诺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争辩说，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他们不能不崇拜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但是也许不如说是毛没有顺应时代而动。无论如何这是今天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看法，不仅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政治和知识界名流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今天也相信，除非重新进行在1957年流产的民主革命并完成这个革命，真正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虽然毛未能超越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作为一个20世纪的民族的中国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仍然是给人深刻印象的。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更广泛地说，是服务于第三世界的利益。

毛同样也坚持中国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其象征是他在1938年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在这方面，毛主义遗产和现在的政策之间也有一个连续性，现在的政策号召实行“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今天的重点更多地是在使经济发展的方法适合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毛的继承者们像他一样仍然是致力于维护中国的文化的个性，无论他们如何坚持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

毛的民族创造者的作用已经成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这几乎是不能置疑的。更为含混和不确定的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终贡献。虽然在50年代中期以后，他最初是用平衡的措词来提出他的思想的，但运用这些思想的方法往往是极不平衡。毫无疑问，这部分地是因为他让自己被他自己的热情搞得忘乎所以，部分地是因为在先前的过火行为使国家达到了灾难的边缘时，他

都依靠他自己的能力进行了重点转移。

事实是，在实践上，“毛主义”在中国国内外越来越意味着用政治热情来替代而不是来激发为求得发展而对经济和技术资源进行的有效动员、过于急切地采取物质条件尚不成熟的社会变革，首先是一个把从教育到物质报酬的一切事物无情地向下而不是向上拉平的政策。

恰恰是这个毛思想的滑稽化（对这个滑稽化他本人要负主要责任），十年前对“新左派”有广泛的感召力，而且在许多地方还有人言词激烈地为它进行辩护。见到了行动中的这种毛主义的中国人，就绝大部分而言，是一点也不想要它的，并在“唯意志论”和“平衡主义”这两题目之下抛弃它。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中抛弃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错误和异化的努力中，如果现领导也将抛弃成为主流毛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对参与管理和反官僚主义提出的强硬主张，这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毛泽东思想被重新解释为披着中国外衣的列宁主义的同义词，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要向苏联形式的变种倒退的话，那就不可能有向着“现代化”的突破，尽管很可能也会取得有实质意义的经济进步。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能够在避免文化革命十年的自拆台脚和无缘无故的狂热性，和避免把社会地位和报酬上的每个差别都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借口的倾向的同时，中国人能够保持对存在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并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和矛盾的强烈的辨别能力——这也许构成了毛主义遗产中最富有成效的成分——那么，他们就可能前进到新形势的文化和技术现代化，这将极大地便利与外部世界的进一步交往。

王宁译自英国《今日历史》杂志第31卷1981年4月



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

〔日〕竹内实

如果让我从中只挑选一个人的话，那么，我选秦始皇。……中国历史第二人要算孔子。……作为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我认为，中国历史第四人是邓小平。

回顾中国悠久的历史，许多人物浮现在眼前。有英雄、豪杰，有义士、贤达，还有宰相、皇帝。

如果让我从中只挑选一个人的话，那么，我选秦始皇。

为什么选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在平定了以前的国家混乱状态之后，他在可以说是中华世界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建起了一个国家“秦国”。而且，他为英雄豪杰们提供了谁都可以夺天下的广阔舞台。他自己指望子孙们能够继承大业，所以叫“始皇帝”。可是结局却召来跟自己一样想当皇帝的人。

中国历代王朝的荣枯盛衰和兴亡交替，实际上都因为有“始皇帝”提供的舞台才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同时也是现代剧）来。

中国历史第二人要算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如果没有孔子的话，那么中华世界只能是一个由汉民族、满民族和蒙古族相互随意厮杀的战场。

孔子没有权力。没有权力，不依靠权力，他却至今不朽。每当时代转换时，总要提出批孔，然而孔子却是打不倒的人物。

如果把始皇帝作为权力政治的第一人的话，

那么孔子就是没有权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这样，权力方面的代表是始皇帝，权威方面的代表是孔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在中华世界的历史潮流中，拥有权力而没有思想的始皇帝和没有权力而只有权威的孔子绝妙的配合，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作为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始皇帝留下的全国混乱状态和军阀混战。

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把他放到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毛泽东与孔子不同，毛泽东是依据外来思想。在流入中国中华世界的外来思想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进入近代还有基督教。太平天国的“革命”，就是由基督教触发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由马克思主义引导的。

总之，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去了。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历史第四人是邓小平。